
《漢書·古今人表》與《漢書·藝文志》淵源關係淺探

汪春泓

嶺南大學中文系

《漢書·古今人表》和《漢書·藝文志》屬於同一部書籍中的兩個部分，二者之間究竟存在何種關係，向來為學界所忽略。本文考察《漢書·古今人表》對某些重要歷史人物之定位，所透露出撰者或褒或貶之評價，此種史學觀，實際上與《漢書·藝文志》較為趨近。雖然《漢書》作者署名為班固，由於《漢書·藝文志》大體上出乎劉向、劉歆父子之《七略》、《別錄》，此啟迪今人，《漢書·古今人表》既與《漢書·藝文志》異曲同工，然則或亦為向、歆父子所擬定。緣乎此種思路，本文就一些特定歷史人物，考辨異同，分析其人位列古今人表上、中、下之理據，追溯與向、歆之淵源，發現其傾向與向、歆確實有不解之緣。故而，認為《漢書·古今人表》大致上乃出自向、歆父子之手筆，此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今人探索《漢書·古今人表》仍有較大的思考空間，有待學者繼續開拓。

關鍵詞：定位 宗親 后戚 揚善懲惡 九品論人 《七略》 裁士

觀《漢書·古今人表》，體現以人物代表歷史的中國史學特點，當一段歷史風流雲散，僅殘剩幾個人物，似乎就足以代言整個錯綜複雜的時代，人物姓名成為象徵符號，古今多少事，盡可為此象徵性符號所涵蓋。

如何看待《漢書·古今人表》？關於此表，歷來多有誤解，宋馬端臨著《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經籍考十八 引夾漈鄭樵曰：

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卻以古今人物強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¹

然而，這並非班固的意見，按《漢書·高帝紀》贊曰：

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²

由於楚元王劉交是高祖同父少弟，因此，劉向搬出了豐公太上皇父，意指得天統者，乃豐公一系，劉交與高祖同屬豐公後人，隱約暗示二者地位亦在伯仲間，可與分庭抗禮，因而，劉向亦屬此天統

1 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5565。

2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一下，頁81-82。

之流裔，其所秉承之天命不凡，絕不遜於代王——文帝之一系。而高帝紀所記述的神跡部分，是按照劉向所述火德上赤這個腳本來結撰的，關於文帝時公孫臣倡言漢當土德、服色上黃，劉向持不同意見，此在《漢書》中盡有載錄；³ 日本森鹿三撰《居延出土的王莽簡》一文就收入一簡曰：「新室以土德代火家」，⁴ 此恐怕是劉歆為王莽篡漢製造輿論，依然認為漢劉屬火德。而鄭樵認為《古今人表》正反映班固的荒謬，其實不然。

錢大昕《春秋論》談及：「班固以上中下九等品古今人，後世猶且嗤之。」⁵ 此反映此表歷來招致議論，且非議者居多。《古今人表》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清梁玉繩《人表考》雖臚列班固、班昭和馬續三人，卻難下定論。⁶ 至於此《古今人表》之體例、內容，唐劉知幾《史通》攻之最力，其書卷四《題目第十一》云：「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⁷《漢書》此表所記，大致以秦為下限，尚不及漢代之人，似乎不合體例；劉知幾《史通》卷三《表曆第七》又云：

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方可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為限乎？⁸

3 參見宋人王楙撰，王文錦點校：《野客叢書》，卷一《漢再受命之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對漢劉再次受命，王楙作出關乎後漢光武帝應運而生的解釋，然而劉向、劉歆則有花落己家的期待。

4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1。

5 錢大昕撰，呂友仁校點：《潛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論》，見《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9。

6 梁玉繩撰：《人表考》，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229。

7 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85。

8 同上注，頁49。

甚至以為此表純屬多餘。顏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⁹認為此表屬未完成稿，但是此種解釋卻缺乏說服力；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卷六 漢書一·古今人表 云：

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予謂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為今人之鑒，俾知貴賤止乎一時，賢否著乎萬世。失德者雖貴必黜，修善者雖賤猶榮。後有作者，繼此而表之，雖百世可知也。觀孟堅〈序〉但云究極經傳，總備古今之略要，初不云褒貶當代，則知此表首尾完具，小顏所云，蓋未喻孟堅之旨。¹⁰

此說有兩點切中肯綮，一則，《漢書·古今人表》為在歷史長河中留下名字者，給予精確定位，或萬古流芳，抑或千古罪人，均在此表中一目了然，其用意在於揚善懲惡，為世人指出向上一路。《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漢書·古今人表》顯然有賡續《春秋》之意，踵其事而增其華，其用心不可謂不深遠廣大；二則，錢大昕深刻領會此表之序所云「究極經傳」，¹¹若問此「經傳」何所指？即其小者而論，是《漢書·藝文志》中劉向所「校經傳諸子詩賦」之「經傳」，甚或乃 六藝略 之《春秋》類；若即其大者而言，則整篇《漢書·藝文志》，甚至當時所能參照的整部古史，均為其所依據的背景資料。古今人表 與 藝文志 同出於《漢書》，前者是人名，而後者則屬文獻書籍以及學術史評述，兩者之間關係甚為密切。其實《漢書》若出自班固一人之手，最後由他潤色、統稿，上述 表、志 理應合若符節，無所牴牾。然而，世所共知， 藝文志 乃班固統合同、歆父子之《別錄》、《七略》而成，基本上此 志 著作權應歸屬向、歆父子。南齊鍾嶸 詩品

9 班固著：《漢書》，卷二十，頁861。

10 錢大昕著，方詩銘、周殿傑校點：《二十二史考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12。

11 《漢書·古今人表》之 序 已經述及此表「究極經傳，繼世相次，備古今之略要云」。

序 涉及：「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似已經體察到二者間有所關聯，如果 古今人表 與 藝文志 並無矛盾，則會引發今人思考，是否 古今人表 之始作俑者也是向、歆父子？答案應該是肯定的。正因為此 表 在全書中顯得突兀甚或另類，其編入書中的企圖就值得探究。

一、創〈表〉以入《漢書》非班氏初衷

《漢書·古今人表》創立者，並不是班固。楊樹達《漢書窺管》指：

〈外戚·孝宣許皇后傳〉記張賀云：「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李廣傳〉記李蔡為人在下中。疑漢世品漢人倫，本有九等之說，而班氏因以立表也。¹²

此說不確，早在《尚書·禹貢》，已經以九品劃分田土。其實中國古代極早就有上智下愚之認識，《論語·陽貨》云：「子曰：『唯上知下愚不移。』」既有上、下，當然不能無中，先秦時期，孔子等論「中」多矣。而世人、世事難逃左中右，也即上中下，出於此種常識，論人、論事也好以三品區分，古今中外，概莫例外。而慮及上中下三分尚嫌粗疏籠統，不夠細膩精確，所以上中下再各自三分，形成上中下九品之說。至《漢書·地理志》，繼承《尚書·禹貢》觀點，「成賦中國」。此影響深遠，曹魏九品中正制，以及鍾嶸《詩品》均可視作其流裔。然而，楊樹達認為因以立 表 者是班固，則似尚有可商榷之處。

選作對證點，以相考較。譬如，《漢書·高帝紀》贊指「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在《漢書·古今人表》裡，劉累作劉綦，公劉在此表之上中，劉綦緊隨其後，列此表之上下，王先謙《補注》

12 楊樹達著：《漢書窺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125。

曰：「見《左傳》、夏紀。」¹³本無甚嘉言懿行，卻被視作上流人物，顯然屬於漢劉暴發戶修家譜的行為。在前漢，推崇屈原不遺餘力者，當以向、歆父子為第一人，在《詩賦略》之「賦」家中，向、歆以為屈原筆端「屈原賦」之屬，而且，劉向頗以屈子自況，九歎儼然屈子附體，此充分證明，在劉向、劉歆心目中，屈原居於崇高的地位，堪稱為人臣者之楷模，而今，在《漢書·古今人表》內，屈原被置於上中之品，僅次於聖人，夏末死諫的關龍逢，則位處上下，關於如此安排，對照向、歆言論，無疑恰如其分，不高亦不低，與其觀點十分合。而班固則不然，他受揚雄影響極深，古即有所謂「揚、班儔也」之稱。《漢書》本傳記述揚雄關於屈原自沉的評價：「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因此，揚雄《法言·吾子》云：「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¹⁴無論如何，語氣中包含微詞，認為屈原「湛身」，豈可稱之為智者的選擇，所以，士人立身處世，不宜效法屈原，而僅對其人作品之麗，極表讚賞。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之天問敘曰：「至於劉向、揚雄，援引經傳，以解釋之，亦不能詳悉。」¹⁵此不過是對自己知識所作的考較而已。《法言·問明》有云：「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¹⁶在揚雄觀念意識中，仁必須與智結合，皋陶、箕子既做到仁至義盡，亦遠離殺身之禍，故而，智者必須能全身避禍，既仁且智，甚至從作為個體的人而言，智更高於仁，若非智者，則其仁亦無所附麗，智更體現人的本質屬性。所以徐復觀說揚雄「有『智』的自覺，所以他和董仲舒這一系列的人相較，他的智性活動，較為純淨而少夾雜。他在

13 班固撰，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026。

14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三，頁57。

15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18。

16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六，頁186。

方法上，把握到非常符合理智活動的要求」，¹⁷此說甚確。按《漢書·敘傳》云：「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¹⁸而班嗣所持「賜書」，是其父親班斿與劉向一起校祕書時，成帝所賜祕書之副本，此所謂「祕書之副」，實為世所罕見者也。由於和班嗣、班彪過從甚密，所以揚雄亦有機會閱讀這些祕籍，眼界為之大開，思想也隨之改變。¹⁹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
曰：「必也，淫。」（《法言·吾子》）

霍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法言·重黎》）

……²⁰

《法言》所述及者，幾乎構成了半部具體而微的《漢書》，其中所涉及人物、評價等，亦大致與《漢書》近似，此實乃拜身為班固「父黨」之所賜也，若無緣經眼班嗣家藏「賜書」，估計揚雄連《太史公書》也無法讀到，而關於前漢武帝之後政治內幕、人物功過，則更無從知曉。後漢王充《論衡·效力》篇認為：「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²¹而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尷尬局面，是因為儒生被排斥於現實政治之外，他們並無緣參政，亦無從閱覽當代史料。《論衡·謝短》篇云：「五經之後，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

17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卷二 揚雄論究，頁521。

18 班固：《漢書》，卷一百上，頁4205。

19 另揚雄 答劉歆書 自述：「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見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411。可見在學朮上，揚雄如饑似渴地補充不足，以改善知識結構，而班氏藏書與石室兩處均是其新知來源。

20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三，頁49，頁382。

21 王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29。

也。」²² 作為班彪門人，王充亦有幸觀看近、現代祕檔資料，因此，他作如斯慨歎。而揚雄當年則從成都移居長安，情形與之相近。那些帝王將相，袞袞諸公，究竟是何方尊神？遠在蜀郡，如隔重山，一旦看清其人嘴臉，並非令揚雄自卑，而是令他愈發自信。《法言·五百》云：「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 人重其祿而輕其道。」²³ 在身、道、祿三者之間，身不可與道、祿同日而語，揚雄絕無殉道衝動，殺身成仁，以身殉道，本身就背道不智，任何一種政治行為都不值得以生命相抵，而與政治、王權發生交集，士人僅僅在道與祿之間作出考量，自然應該重道而輕祿，不能因祿而叛道，固守一己主體意識，秉持獨立見解，甚或批判政治、社會，這使得揚雄即使「位不過侍郎」，卻盡可怡然自得，大有《老子》所謂「被褐懷玉」之感。

徐復觀所謂「揚雄有『智』的自覺」，並且其「智性活動，較為純淨而少夾雜」，²⁴ 大體上，此種觀察是準確的，而揚雄之所以鑄就如此學術特質，固然因在蜀郡深受老子、嚴遵平 迪，身負五世單傳責任，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而來到長安，目睹政治真實面，在班氏「祕書」和朝廷實況兩方面，逐漸認識政治本質，於是在成都時，從書本所獲得對於政治的理解，大致被顛覆，想象回歸於現實，理想瞬間幻滅，這更令其思想發生巨變，甚至達到脫胎換骨之程度。於是，其關於政治之識見，就與紙上得來者不同，知古且又知今，而知今正可祛除迂闊，以修正知古者之食古不化，揚雄開始以政治眼光看政治，而非藉經學教義來紙上談兵。

讀揚雄著述，雖然他有明確的宗經觀，可是他卻拔出於當時的經學氛圍，從學術師承、淵源看，揚雄絕少受當時經學「師法」的限制，其思想之清明、重實證以及少夾雜，與董仲舒、劉向等藉經學以論政似可截然判分。其《法言·吾子》云：

22 同上注，頁 126。

23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八，頁 251。

24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 揚雄論究，頁 521。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
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
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²⁵

此番自問自答，其實極具層次感，首先，揚雄尊重賦作為文體的特點，並非從文章學角度來否定賦作價值，其人反思少作，蓋出於大賦文體與政治相結合，認為諷不敵勸，勸百而諷一，具有負面作用。《法言·吾子》云：「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²⁶揚雄 答劉歆書 自述：「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²⁷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一樣，俱有尚麗特徵，對此揚雄並無異議，也不否認，只是辭人之賦尚麗過甚，其間有獻媚王權之嫌。而自己少年時代，仰慕司馬相如，喜歡作賦，此猶如「童子彫蟲篆刻」一般，屬幼稚行為。《漢書》本傳記載「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行年四十餘，已經人到壯歲，揚雄獻賦於成帝，所作 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及長楊賦等，可謂嘔心瀝血，傑構迭出。然而，司馬相如所面對之武帝，具「雄才大略」，所統領之帝國，國勢尚如日中天；而今，自己所處之成帝時代，前漢已經趨向衰敗，成帝無繼嗣，困擾國運；加之后戚干政，先有成帝寵幸趙飛燕，後有哀帝時，丁明、傅晏、董賢用事，直至王莽篡漢。揚雄所直面之政治，堪謂無序，積重難返。所以，他將所作所為一分為二，諸如天文、曆學研究、學術撰述等，屬於安貧樂道之修為，乃不朽之盛事；²⁸而至於大賦寫作，則諷諫闕如，因此，僅淪為干祿之俗事，故而，「壯夫不為也」。京師親身見聞、體驗，使揚雄對大賦寫作熱情銳減，甚至連作為文字遊戲，亦興味索然。至此，道與祿幾乎分道揚鑣。

25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三，頁45。

26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二，頁49。

27 嚴可均輯校：《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漢文》，卷五十二，頁411。

28 桓譚曰：「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見桓譚撰，朱謙之校輯：《新輯本桓譚新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

分析揚雄心路歷程，遂可對其「屈原論」有深層次的認識，關於屈原自沉，在他看來，絕對屬於無謂之舉，為人臣者，何以出此下策呢！揚雄極其珍視生命，所以，屈原盡忠楚國，始終不渝，揚雄雖表感佩，卻絕不視之為精神同道，此在其《反離騷》、《法言》等作品中，均有鮮明的表述。顯然，在根本上，對屈原的人生選擇，揚雄斷然給予否定。

此亦關涉對於老子道家的評價，揚雄推崇儒家《五經》，《法言·吾子》認為：「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其識道也。」《五經》絕對要高於諸子，這是揚雄所持基本觀點。然而，揚雄所謂《五經》概念卻不同於前漢主流經學，他超越《漢書·五行志》的解經模式，當時流行以「《春秋》之義」附會政治，此在揚雄著述中幾乎絕跡。這說明，在學術上，揚雄不肯隨波逐流，他未曾被京師學風所裹挾，顯得卓犖不群。前漢雖獨尊儒術，然去聖久遠，經學漸與孔儒源頭相隔絕，揚雄痛感於此，孔子被後學烏煙瘴氣所籠罩，無論《公羊》或《穀梁》等，乃至當時所謂《五經》博士，所傳遞的已非孔子真義，所以須摧陷廓清，撥雲見日，然則救弊之途，惟有解蔽，從辯人到君子，從君子直至聖人，層層遞進，追溯原典，反映揚雄正本清源意向。

而在儒、道原點上，其實非「道不同不相為謀」，孔、老本是相通的。依照《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說：「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²⁹顯然揚雄的「玄」融會儒、道，且以孔、老並列，除了現實王政，「玄」作為天道法則，統攝一切，揚雄探尋天道法則，而王政、人事諸端，最終亦須受天道法則規訓，而在此層面，孔、老根本上是一致的；揚雄解難曰：「師曠之調鍾，知音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³⁰亦以老子作結，

29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五十九，頁1898。

30 班固：《漢書》，卷八十七，頁3578。

暗喻在最終極處、最精微處，其實孔與老意趣相近，只不過《老子》在仁義等概念方面，說一些憤激之詞耳。《法言·問道》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法言·寡見》云：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³¹

《五經》繁瑣化，甚至被臆造，被曲解，揚雄譏刺此種學風，主張返歸孔子，孔子思想平易近人，而在前漢後期，《老子》作為他山之石，恰可發揮挽救儒弊之助益。《法言·君子》：「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³²顯示揚雄完全接受道家「自然之道」，此幾乎可視作其認識論、方法論的思想基礎。

而署名班固著《漢書》，內列 揚雄傳，堪謂濃墨重彩，佔有較大篇幅，在思想上，班固與揚雄十分相近，甚至在某些問題上，班固堪謂揚雄之翻版。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漢書·揚雄傳》）³³

（班固）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後漢書·班彪列傳》）³⁴

31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三，頁 222。

32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十二，頁 521。

33 班固：《漢書》，卷八十七，頁 3514。

34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頁 1330。

兩者學風何其相似乃爾！譬如關於司馬遷《太史公書》，《漢書·揚雄傳》記述揚雄的評述：「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³⁵此開《漢書·司馬遷傳》中，班氏對司馬遷著名的批評：「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³⁶其祖述揚雄，一望而知矣。對於司馬遷身陷極刑，班固表示惋惜：「其所以自悼傷，小雅 巷伯之倫。夫唯 大雅 『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³⁷在「全命避害」這點上，班固則更唯揚雄馬首是瞻，此自然連帶關於屈原的評價，亦與揚雄如出一轍。察諸班固 離騷序，其實，屈 騷 應在揚雄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範疇之內，是「詩人之賦」向「辭人之賦」過渡之津梁。³⁸然而，由於否定 離騷 式情感，以致於對其作品藝術亦漠然視之，僅讚之以「弘博麗雅」四字，卻譏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³⁹此節文字，將屈原定位為「士」，忽視其楚國宗室之身分，不顧屈原對楚國所肩負責任感，實遠超乎一般士人之上。而作為「士」，在班固眼裡，屈原混淆了士所擔當的儒家道統和楚國政治命運之間的界線，前者永恆、不朽，後者則屬一時一地，不值得士人投注其全部生命，況且，在揚、班意識中，士人「不受世患」乃智者為人之底線，若憤而沉江，就與其處世原則相去難以道里計了。

班彪、班固父子亦深受老莊潛移默化之影響，在此點上，揚、班絕堪稱知音者也。《漢書·敘傳》所載班彪著 王命論，論述王莽末年，雖戰亂紛起，天下分裂，然而政歸劉氏，卻是勢之所趨，班彪臚列漢劉祥瑞，向隗囂闡述一句老聃名言：「夫代大匠 者，稀

35 班固：《漢書》，卷八十七，頁 3580。

36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頁 2737。

37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頁 2738。

38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見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 45。

39 嚴可均輯校：《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後漢文》，卷二十五，頁 611。

有不傷其手矣。」⁴⁰《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⁴¹兩人自比莊周、惠施之交情，而尹敏因不信圖讖，以致忤逆聖旨，⁴²從此也反證班彪對於莊老極具興會。范曄稱讚：

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⁴³

義近乎李善注言彪「性好莊老」。⁴⁴〔按《後漢書·班彪列傳》，范曄論曰：「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于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已經發難班氏譏刺屈原「是非頗謬於聖人」，而自己卻不肯「守節」，兩者之間，何者更有謬於聖人呢？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崔譔云：「齊物 七章，此〔指「夫道未始有封」句〕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⁴⁵這說明班固深研《莊子》，這構成班氏一門家學之重要部分，雖班彪、班固好以儒者示人，此乃時風眾勢使然，但是老莊思想影響其人生觀、認識論，其深刻性並不稍遜於儒家一邊。察諸班固 離騷序 譏屈原「露才揚己」，對此不能以正儒思想來作解釋，

40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476，史漢比較研究之一例 探究班彪 王命論 所持「劉氏家天下的天命論宿命論」的心理因素，指出：「我推測，這是來自通過外戚關係所保持的對劉氏的感情，及吸收了當時社會心理的反映，而將其天命化、理論化。」另《世說新語·言語》第35條劉琨對溫嶠說：「班彪識劉氏之復興」，見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上卷，頁96。

41 范曄：《後漢書》，卷七十九上，頁2559。

42 《後漢書·方術列傳》載：「及光武尤信讖言……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反對讖言，莊老道家自然論屬重要思想資源，見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二上，頁2705。

43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頁1329。

44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九，頁142 班叔皮 北征賦 注。

45 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二十六，頁1422。

觀照上述范曄之論，蓋意指班氏父子並非醇儒，而羸雜者主要就是莊、老元素，很大程度上，班氏對屈原的譏諷，乃出自老莊的視角，以老莊觀屈子，屈子自然不合時宜之至矣。班固《幽通賦》說：

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後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⁴⁶

班固直面自己內心深處，反映其思想的困惑，也流露出個體對於社會、政治的無奈，在惶惑之中，個體渺小，須隨順於人世激流，寄身於茫然之中。在兩漢士人精神世界中，這種情緒或深或淺地普遍存在，這就為士人轉向老莊提供了推力，老莊之學也因此成為一股不絕的潛流，永遠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班固《幽通賦》又說：

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周、賈蕩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服。⁴⁷

借用《莊子·齊物論》，以消解執著，看似主體性之弱化，然而，透過此種對政治的疏離感，卻更加令讀者感到，柔弱勝剛強，關於個我自由意志、獨立精神，作者呈現更強力的捍衛，「信畏犧而忌服」，顯得狷介孤傲，班固拒絕為人操縱，徒然成為政治之犧牲。

前漢武、昭、宣、元時期，由於官學主流獨尊儒術，令老莊表面蟄伏；而至於哀、平，過渡至莽新，也即前漢末期，老莊又呈

46 班固：《漢書》，卷一百上，頁4216。

47 《漢書·敘傳》記述班彪從兄「（班）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擊，既繫攀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實質上，班彪與班嗣這種思想十分接近。見《漢書》，卷一百上，頁4205。

現抬頭之跡象，此符合當時思想界演變趨勢，亦契合其內在邏輯。所以，在《古今人表》內，置屈原於上中、老子於中上、莊周於中下，⁴⁸ 屈原過高，老莊過低，這與揚雄、班氏觀點顯然不符。牽一髮而動全身，比干被置於《古今人表》之上中，關龍逢則被列於《古今人表》之上下，此類死諫之士，揚、班絕不讚賞，卻為屈原、劉向所推崇，如此定位顯然與揚、班不合，應屬向、歆之意見。嘗一臠而知全鑊，楊樹達謂「班氏因以立表也」，認為班固是《古今人表》創立者，若將此表著作權歸諸班氏，尚缺乏堅實證據和說服力，需要重新斟酌。

二、《漢書·古今人表》政治性特徵與向、歆父子之淵源

李學勤先生《談經學與文獻學的關係》說：「最近看錢穆先生《新亞遺鐸》裡的演講，他強調『儒學為中國文化主要骨幹』，我們還要說經學是儒學的核心。」⁴⁹ 然而，比較西漢和東漢之經學，《漢書·古今人表》更體現西漢經學影響的特徵，尚具有包容的性質；不像東漢時期，經學更趨教條化，胸襟更顯單一狹窄。按《漢書·古今人表》九品論人，上已述及，鍾嶸《詩品序》云：「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七略》以儒家為政治、文化之主幹，體現鮮明的政治色彩，而「九品論人」則亦不例外。實際上，「九品論人」與「《七略》裁士」之間存在著對應關係，可謂一體之兩面，二者可互相依存。

《漢書·藝文志》記載：

48 楊樹達《漢書窺管》云：「老子，周壽昌曰：唐天寶元年詔：《漢書·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宋徽宗詔：《史記·老子傳》升列傳之首，自為一帙，前《漢書·古今人表》列於上聖，後來各本俱遵之，惟毛本列第四，猶存班《書》元式。先謙曰：官本列上上。樹達按：景祐本列中上。」見楊樹達：《漢書窺管》，頁127。宋景祐本老子列第四，這是班《書》原來的排序，當以此為準。

49 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45。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⁵⁰

關於向、歆父子之事業，於此可見一斑，劉向除了獨撰《別錄》之外，《七略》則凝聚向、歆之共同心力，然而，劉向的勞績似更大，其間《六藝略》、《諸子略》和《詩賦略》之告竣，劉向當為主要捉刀者，貫徹著其人之學術思想。王充《論衡·案書》云：「《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王充已思考《六略》以及所涉及文獻的「指趣」問題，確實，考察六藝、諸子以及詩賦三略，其主與從、朝或野，涇渭判分，若與《古今人表》相對看，其實《古今人表》之座次排定，幾乎皆從中來。

前漢道家和儒家地位沉浮，決定著老、孔座次之高下。《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⁵¹ 司馬談幾乎毫無顧忌地批評儒家的不足，在其眼裡，儒家仿佛「屠龍術」，不切實用，世人若敬而遠之，則可矣！而在現實政治中，卻很難付諸事用。推行儒家，猶如削足適履，以強人從己，此遭司馬談堅決抵制。所以司馬談《論六家要指》繼續評論曰：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

50 班固：《漢書》，卷三十，頁 1701。

51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一三〇，頁 3289。

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⁵²

道家和儒家相互比較，道家豈止可以補闕儒家之罅漏，甚至具備儒家所不具有的優勢，且其一家兼具陰陽、儒墨及名法之優長，更加適合政治之需要，有助開 良性政治，且為之提供理論指引。因此，在司馬談所代表的漢朝以來黃老道德之術一派，其心目中「老子」或者「《老子》」擁有與聖人相頡頏之尊位，若以九品論之，則絕對屬道德之始祖，上品之高士也。

然而在前漢，《老子》地位並不穩固，很快就遭遇挑戰。《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⁵³竇太后是《老子》尊崇地位的保護者，而她對轅固生這番詰問，預示著道、儒兩家地位此消彼長，「黃老」將被《五經》所置換，儒家《五經》必將成為官方及主流學術。而武帝時代，恰是崇儒的轉捩點，時值宣、元、成三朝，學界、思想界便呈現大力弘儒之景象，儒家聲勢之 赫，絕對壓倒其餘諸子各家，此與司馬遷時代，恰好相映成趣。

從孔子問禮於老子的記述，⁵⁴到《漢書·古今人表》老子僅列名第四（中上），變動幅度甚劇。按向、歆觀點，則與司馬氏父子迥別，漢志 云：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

52 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頁3289。

53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一，頁3123。

54 見《史記·老子列傳》，這類似「齊東野人之語」或《莊子》式的杜撰，其實孔子何嘗「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⁵⁵

這正是向、歆的評述，認為即使《老子》尚有可取之處，但是它「放者為之」，譬如莊周之流，卻絕對不合時宜，社會發展，日益複雜，獨任清虛，豈可為治！這亦反映實際政治情形；漢志又云：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於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然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⁵⁶

這裡已經標舉出堯、舜、文、武及仲尼，凸顯儒家一系之大聖，隱約已樹立起道統意識，並且過往歷史證明其成功，他們崇尚仁義，才代表人類社會至高無上的「道」。而其間關於儒之「惑者」、「辟者」之批判，認為導致《五經》淆亂、儒學式微，應歸咎於「辟儒」之罪責。而此種清醒的儒學反省精神，以及對於儒學本意的追尋，似乎更多出自劉歆之主張。⁵⁷

《漢書·古今人表》列名上上品者計有：宓羲氏、神農氏、軒

55 班固：《漢書》，卷三十，頁1732。

56 同上注，頁1728。

57 《漢書·董仲舒傳》說：「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這段話體現向、歆之不同，在出仕莽新之前，劉歆更具學者的氣質。

轅氏、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殷商氏、文王周氏、武王、周公、仲尼，這些人物超凡入聖，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面，都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所謂：「爰自風姓，暨於孔氏。」此正昭示著儒家人文之精神譜系，表彰引領人類文明之巔峰巨人，此無疑與向、歆在《藝文志》中所展現之思想傾向契合無間。

而前漢何以逐漸告別黃老政治？此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韓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⁵⁸ 儒和俠代表著社會中文、武兩端，其腦力、體力越具異稟，則其自主性亦越發強烈，此俱含有危害社會穩定之隱患。關於「儒」之定義，後漢許慎《說文解字》釋「儒」為：「柔也。」此解比較能反映秦漢之際「儒」的含義，此「儒」和當時所謂「文學」一詞義近，其內涵之豐富，溢出單純孔子儒家之概念，可以視作當時承載學術文化且有識見之士人。

（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嶧山，頌功業。於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泰山……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漢書·郊祀志上》）⁵⁹

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史記·叔孫通列傳》）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史記·留侯世家》）⁶⁰

雖經秦焚書坑儒，史書可能誇大了其焚坑之烈度，故而，在咸陽、齊魯等區域，依然可見儒生活動之身影，前漢實施尊儒舉措，同時亦規範儒學，意味著在思想、學術界進行整肅，所設立之《五

58 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49。

59 班固：《漢書》，卷二十五上，頁1201-1205。

60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頁2720；卷五十五，頁2041。

經》博士，以及講究《春秋》之義，根本目的就是在儒學中，汲取有利於集權政治之資源，以建樹大一統社會之人倫秩序。

至於游俠一類人物，

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豪傑則游俠通姦……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漢書·地理志下》）

居下邳，為任俠。（《史記·留侯世家》）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史記·季布列傳》）

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史記·季布列傳》）

……⁶¹

政治權威在乎政從己出，切忌政出多門，然上述「灌夫」一條材料，說明才傑之士往往非儒即俠。上述《漢書·刑法志》所云，朝中「威福之臣」和邑內「豪傑之俠」，此輩或越俎代庖，或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都有損王權威勢。《史記·游俠列傳》中，太史公評述：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⁶²

當管治輻射，力有所不逮，未能懲惡揚善、保護弱小時，游俠自然應運而生。游俠代替郡縣、朝廷主持正義和公道，置官府、朝廷於不顧。此輩秉持一己之道義，一意孤行，替天行道，其社會影響力似乎更在拘拘小儒之上，而且作為一股社會暗流，社會提供適宜的

61 分別見於班固：《漢書》，卷二十八下，頁1642。司馬遷：《史記》，卷五十五，頁2036；《史記》，卷一百，頁2729；《史記》，卷一百，頁2729。

62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四，頁3181。

溫床，其生存時間亦較長久，從上述所徵引材料看，自秦漢之際，以至前漢中後期，游俠從未退出過歷史舞臺。司馬遷肯定其人存世的價值，他們捨身忘死，救人於厄困，未嘗不是對政治失衡的一種矯正，這樣的力量，雖自下而上，來自民間，但是應視為自然的社會生態，俠客亦有值得讚許之處。

然而，司馬遷的看法卻為儒家者流所否定，漢代從戰國紛爭過渡到天下一統，國家主義者看到這股力量極具破壞性，若不加以遏制，放任此輩恣意妄為，則會動搖社會根基。《漢書·司馬遷傳》之「贊曰」指司馬遷：「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接著說「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云云，此說明以游俠為「姦雄」，至少獲得劉向的認同，甚至此種觀點就肇端乎劉向，在「處士」和「姦雄」之間，更讚賞前者，⁶³由於前者循規蹈矩，服從威權，對社會不構成絲毫威脅。所以，關於社會治理，上述《漢書·刑法志》傾向於「善乎！孫卿之論刑也」，站在社會統治集團立場論治國，《荀子·禮論》等篇乃至理名言，具有實際的效用。韓非子是荀卿門下弟子，其五蠹所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對此，漢劉朝廷必須正視，且需軟硬兼施、雙管齊下地加以轄制。

按《漢書·古今人表》王先謙《補注》引張晏曰：「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⁶⁴而今本《漢書·古今人表》中，魯仲連、藺相如列於上中，田單位於中上，雖古今次序紊亂，然張晏所見古本，當更為可靠。這些戰國士人如魯仲連、藺相如、田單，意氣風發，不可一世，卻僅位於《古今人表》之第五，以及豫讓處在第四，其理據何在呢？

其實《史記·游俠列傳》所記載者均非義薄雲天的真俠士，而俠之大者，當以魯仲連、豫讓等為翹楚，從戰國後期以至漢初，在精神層面，他們博得士人普遍的強烈共鳴，在其心目中，此輩或深明大義，或至情至義，且為個我自由意志之象徵，堪稱英雄偶像，

63 揚雄更多從「隱」的角度肯定「處士」，與劉向有所歧異。

64 王先謙：《漢書補注》，頁1007。

備受景仰。但是到前漢中後期，對這些人的評價卻產生逆轉，古今人表有意遮蔽其光輝，壓制其影響力，所體現者，乃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史記·商君列傳》《集解》引《新序》論曰：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⁶⁵

此說比較公允，表彰商鞅幫助秦孝公奠定霸業之基礎，而且，商鞅舉措得宜，公而忘私，其品質亦值得肯定，只是他過於慘礪少恩，招致「身死車裂」的悲慘下場，劉向對商鞅之評價，既讚揚又惋惜，而此在漢代士人中，確乎屬於另類之聲音。

世所公認，漢承秦制，體現在職官制度、疆域版圖諸方面，作為繼承前朝遺產之新朝，可以說，若無秦，豈有漢。然漢初以來，對於暴秦，大肆撻伐，自然徹底否定秦始皇和法家，不留絲毫餘地。然而，處於朝廷內部，站在統治集團角度，體會到法家有助於治理，甚至法家學說不可或缺，上述所謂「孫卿之論刑也」，亦正是《漢書·藝文志》所述法家「信賞必罰，以輔禮制」之意，儒家敦禮，法家尚法，然而，以禮治國，立意甚高，有時卻不切實際，必須輔之以法，禮法兼施，按劉向所見，與荀子所講的「禮法之士」相一致，「法」能起到「禮」所未能達到的效用，換言之，法制才是社會的定海神針。所以，《漢書·古今人表》中，孫卿與孟子並列上

65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八，頁2238，注四。

中；⁶⁶而商鞅、申子竟然列於中上，臭名昭著之申、商幾乎被翻案正名，以致梁玉繩質疑：「疑不在中上」，但是他也並無版本依據以證其非。在《古今人表》中，韓非亦列名於中上，而秦始皇和李斯則處在中下。總之，反觀漢初以來洶湧的反秦思潮，對待秦政和法家人物，《古今人表》之態度有所緩和，在此表中，刑名、法家之流並未遭到完全否定和徹底清算，尤其商、韓著述，乃法家學說之集大成，其歷史影響非但未曾抹煞，相反，還得到了肯定和禮遇。

在本質上，《荀子》性惡論是法家理論的基礎，而揚雄《法言·修身》云：「人之性也，善惡混。」⁶⁷揚雄提出性為「善惡混」說，則動搖了法家的理論基礎，《法言·君子》云：「吾於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為不異。」⁶⁸《法言·問道》說：「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⁶⁹以揚雄評價尺度來衡量，申、韓反人類，絕對要打入下品之煉獄，絕對不會重見天日！與之相似，《漢書·敘傳》載班固《答竇戲》對比儒、法兩家作，譏諷商鞅、李斯，「朝為榮華，夕而焦瘁」；感嘆韓非不得善終。然而，「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⁷⁰在儒、法之間，絕對不存在互相調和的可能性。從對法家人物的歷史定位來看，《古今人表》不可能出自班固之手。

觀《漢書·古今人表》之中，《漢書·藝文志》劃歸道家類人物，老子居中上，嚴（莊）子居中下；而管仲卻在上中，管子成為道家類人物中排名最高者。《論語·憲問》中孔子感慨：「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然而《論語·八佾》云：「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兩種評價存在矛盾。對此，學界一般認為，這是齊《論語》和魯《論

66 李學勤 試說楚簡中的《說命》佚文 談到：「殷商名王高宗武丁時的賢相傳說，《漢書·古今人表》列於『上中仁人』……然而在出土古文字裡一直沒有找到傳說。」李先生首先在新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內，終於找到「傳薦」，也即「傳說」的記載。見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頁 468。

67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三，頁 85。

68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十二，頁 499。

69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四，頁 130。

70 班固：《漢書》，卷一百上，頁 4227。

語》遭張禹混淆的結果，⁷¹但是從劉向觀點看，由於《管子》一書屬齊法家之集大成者，該書博大精深，影響巨大，劉向崇拜管仲之思想、學術。而管仲具有道法家的色彩，⁷²《漢書·元帝紀》引述宣帝云：「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⁷³而齊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作為王者師典範、齊桓霸業的輔佐者，於是管仲備受尊崇。《漢書·賈誼傳》說：「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⁷⁴《漢書·董仲舒傳》則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⁷⁵劉向指董仲舒為「儒者宗」，對於董仲舒的這番評論，估計亦出自劉向，此二則評語凸顯「通達國體」四字，而非空談國事。古今人表 品第人物，兼及事功和德行之二端，體現兼顧政統與道統之特點，既高懸道統，卻並非以道統酷評政統，故在齊桓霸業光芒映照下，所謂管仲「器小」幾乎不值一提，依然令管仲高踞上中之位，鮑叔牙也隨之居上下；此與執筆者具有一定的政治經驗有關，善於體悟政治實際和甘苦，劉向恰是其不二之人哉！

漢志 云：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諛而棄其信。⁷⁶

前漢獨尊儒術以來，對於縱橫家採取禁絕措施，故此，蘇秦、張儀列於中下，可見巧言令色鮮矣仁！天下一統，此輩長袖善舞，巧舌如簧，已然不容存身於世間矣。

71 《漢書·藝文志》謂「張氏最後而行於世」，見班固：《漢書》，卷三十，頁1717。

72 在後世目錄學上，《管子》究竟應歸屬「道家」或「法家」，存在不同看法。

73 班固：《漢書》，卷九，頁277。

74 班固：《漢書》，卷四十八，頁2265。

75 班固：《漢書》，卷五十六，頁2526。

76 班固：《漢書》，卷三十，頁1740。

前漢後期，古文經學駸駸乎有後來居上之勢，此與劉歆推轂有關。《漢書·楚元王傳》說：

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父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尤自持其《穀梁》義。⁷⁷

此敘述或許並不符合事實，桓譚《新論》云：「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又云：

《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矣。《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裡，相持（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⁷⁸

武帝朝以下，《春秋三傳》之《公羊傳》一派風頭甚健，宣帝時，又曾表彰《穀梁春秋》，惟獨《左氏傳》遭遇冷落。據此可知，劉氏一門「珍重《左氏》」，堪稱向、歆父子甚至全家的共同愛好；王充《論衡·案書》述及：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寔、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⁷⁹

77 班固：《漢書》，卷三十六，頁1967。

78 桓譚撰，朱謙之校輯：《新輯本桓譚新論》，卷九 正經篇，頁39。

79 王充：《論衡》，頁272。

此記載進一步佐證向、歆父子重視《左氏》的原因，在向、歆家學觀念來看，《公》、《穀》的價值當然遠在《左氏》之下。而這種意見，在前漢成、哀之際，尚屬非主流思想，自然會遭到「太常博士」抵制，令劉歆頗有孤掌難鳴之感。然而，這樣的經學觀卻在《漢書·古今人表》內不折不扣地呈現出來，按《漢書·古今人表》，左丘明居上中，而公羊子、穀梁子則處中上，可見《三傳》始創者之成就高下，並非軒輊不分，《左氏傳》要遠高於《公》、《穀》兩家。並且，在《古今人表》中，左丘明的地位甚至高於子夏，在儒家傳經歷史上，子夏功不可沒。⁸⁰ 然而，子夏承傳之功更多屬於述而不作，左丘明則更具備「作」的元素，所以按《古今人表》，作為孔門四科之一文學的代表人物，子夏僅居上下，較之於位居上中的左丘明，尚未達一間。而這樣的價值觀或許亦影響到班彪以至王充，王充在《論衡》中顯著表達了對於「述」和「作」的不同看法，這種觀念當可追溯到向、歆。

在《古今人表》所記錄每個人背後，都潛藏著一段影響歷史的故事，即使或宏大，或細微，卻總與政治相關連，這是由中國歷史之傳統所決定的。而漢代士人好談論古今，借古諷今，通古今之變，其重心還是在於今，故而，考察《古今人表》之近「今」部分，有助於瞭解其作者之政治觀。

《史記·袁盎列傳》述及：「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⁸¹ 楚元王劉交繼承者為劉郢客，而劉郢客的繼位者則是劉戊，在吳楚之亂中，劉戊遭遇大厄，然而，景帝尚不願或不敢徹底消滅諸侯藩國，故而選取楚元王另外一子劉禮為楚王，按《漢書·王子侯表》，楚元王子劉禮、劉富、劉歲、劉執和劉調，大多一傳再傳之後，就或無後或反誅或遭免。而劉富一系：劉富 辟彊 劉德 劉向 劉歆，對於「楚國」懷有特殊感情，凡是

80 嚴耕望《戰國學術地理與人才分佈》指出：「五經多出於子夏，未必可信，然亦足觀戰國初年，子夏西河講學之盛，故後儒爭相託附也。」見嚴耕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上冊，頁33。

81 司馬遷：《史記》，卷一〇一，頁2744。

在史籍中出現者，楚事無論巨細，楚人不分貴賤，在《古今人表》中，幾乎悉數被記載下來，《古今人表》此一特點尚待作更細緻的考察。⁸²

《古今人表》較為接近「今」的部分，也折射宮廷鬥爭之痕跡。按楚國忠臣屈原事蹟在《古今人表》之尾聲部分，幾乎完整地被表現出來，楚國朝廷之內，屈原的對立面，都遭到史家筆鋒之橫掃，譬如上官大夫位處中中，子椒、子蘭位於中下，靳尚處乎下上，而夫人鄭袖則置之於下下；楚國當時國君楚懷王、楚頃襄王均位乎下上；而在辭賦寫作方面，與屈原同時代的宋玉位在中中、唐勒、景差（差），則屬中下。將這些人物關係勾連起來，其實就構成了一篇《史記·屈原列傳》，顯示《古今人表》作者對於屈原及其身世抱有特殊的關注。⁸³而在上中的屈原與下下之鄭袖，正構成了朝廷宗室和后戚之間緊張的對峙關係，層次感十分豐富，亦映照出作者細膩的褒貶情感，實質上，屈原對立面人物與鄭袖狼狽為奸，乃一丘之貉，大可一併貶至下下，但是，為了突出鄭袖屬惡人中之惡人，要宣洩編撰者深惡痛絕之憤恨，所以才單獨將此人置於下下，此種用心極具象徵意義，所指向之「今」，也就是前漢的實際政治態勢，甚至暗喻趙飛燕等后妃，而編撰者似自比屈原。邢義田《母權·外戚·儒生——王莽篡漢的幾點解釋》一文指出：

從漢初呂后開始，經昭、宣時期的霍氏，到成、哀以後的王氏，外戚干政，一直是西漢政治的顯著現象。西漢的天子和朝臣對此相當警覺，也頗為防範。⁸⁴

此也道出了《古今人表》所寄寓的一層深意，此也應關聯作為楚元

82 班固：《漢書》，卷十五，頁427-524。

83 劉向編著，石光瑛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卷第七 節士 第19則 屈原曰：「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936。

84 邢義田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61。

王後人之向、歆父子處境來思索，他們念茲在茲者，自然是朝中涉及自身利益的政治環境。因此，揚雄輩可以超越后戚、宗室的矛盾、鬥爭，相對而言，可以置身局外，或者發一些宏觀層面的議論。可是，向、歆則不然，他們處於政治風圈之內，所面對和體會的是具體的政治較量，而劉德、劉向以及劉歆一生都在和后戚勢力殊死搏鬥，這種微妙、激烈的內心世界，通過楚國後期的政治結局，在《古今人表》中，以暗示手法表露無遺，此種古今政治指向，惟有結合《漢書·楚元王傳》，方可豁然開朗。⁸⁵

《古今人表》所載最晚近者，為秦二世覆滅，以至陳勝、吳廣和項梁、項羽起兵反秦，故而，此「今」乃以秦為誡，意味深長，與漢初以來的反秦思潮相銜接。而項梁、項羽和陳勝、吳廣位列《古今人表》之中下，意味著這些開啟秦末戰亂的人物具有首義之功，卻非真命天子。而昏庸暴戾的秦二世處在下中、趙高則更處於下下，這展現警示之用意，沒有秦皇朝的暴政，何至於官逼民反、狼煙四起，令漢劉最終收獲得天下的果實。而秦皇朝走向窮途末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昏君和姦臣之勾結，而這姦臣又特指朝中宦官閹孽趙高一類人物，將秦朝引向萬劫不復之死地。

《古今人表》寄託幽深，楚國後期尚有屈原挺身而出，誓死力挽狂瀾；而至秦朝崩潰之前夕呢？朝廷已無忠臣置喙之餘地，幾乎盡被奸佞之臣所盤踞，然則秦二世君臣必然死無葬身之地。據此以觀《漢書》之《佞幸傳》、《外戚傳》和《元后傳》，亦能感悟到《古今人表》深深的憂思，顯然，此與向、歆父子存在著不解之緣。

三、結論

關於《古今人表》，惟錢大昕持論公允、深刻，其跋《漢書·古今人表》云：

⁸⁵ 《漢書》最後以《外戚傳》、《元后傳》和《王莽傳》作結，《漢書·古今人表》與之有密切的對應關係。

此表為後人詬病久矣，予獨愛其表章正學，有功名教，識見夙非尋常所能及。觀其列孔子於上聖，顏、閔、子思、孟、荀於大賢，孔氏弟子列上等者三十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降居中等，孔氏譜系具列表中，儼然以統緒屬之。其敘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論語》二十篇中人物，悉著於表，而他書則有去取。後儒尊信《論語》，其端實啓於此，而千餘年來鮮有闡其微者。遺文具在，可覆按也。古賢具此特識，故能卓然為史家之宗，徒以文章雄跨百代推之，猶淺之為丈夫矣。⁸⁶

此表明 古今人表 非率爾操觚之作，每一歷史時期，某人若能垂名青史，或遺臭千古，被 古今人表 納入其視野，透過審慎斟酌，且深思熟慮，以判斷其人在九品中的地位，此種非局限於一朝一姓一族的胸襟，體現史家的終極關懷，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任何一朝一姓一族俱要經受大浪淘沙，其興衰成敗亦在人心的一念之差，而政治若為下品惡人所主宰，絕對是一朝一姓一族的災禍。前車之鑒，借古諷今，端賴 古今人表 提升了《漢書》的史學境界，捨棄此篇，則《漢書》缺少了畫龍之點睛。

而 古今人表 作出「九品」判斷之依據，錢大昕認為此表充分體現儒家思想之特質，是站在儒家立場，以觀照衡量歷史人物。當然，亦體現其善善惡惡的《春秋》之義，最終呈現一幅中華民族的人性圖譜，令讀者生發向善之心，從而，整體提升本民族之仁義禮智信的品格，同時亦抑制杜絕人性之惡念，當大部分人願意棄惡從善之時，社會就會多一點光明和美好。

古今人表 理路連貫，一氣呵成，絕非不同時間、不同編撰者之作品，其作者當屬向、歆父子，似存在較高的可能性！

86 錢大昕撰，呂友仁校點：《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題跋二，見《潛研堂集》，頁484。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bles of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Individuals” and “Monograph on Belles-lettres” in the *Hanshu*

WANG Chun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ngnan University

The “Tables of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Individuals” and “Monograph on Belles-lettres” comprise two sections of the *Hanshu*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ut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has remained unheeded in relevant scholarship.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the author’s placement of certain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Tables” and his positive or negative evaluation of them. This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 and practice is in fact quit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Monograph.” Although the *Hanshu* is attributed to Ban Gu (32–92), the “Monograph” was for the most part derived from Liu Xiang (77–6 B.C.) and his son Liu Xin’s (d. A.D. 23) *Seven Synopses* and *Classified Catalogue*. This allows a speculation: give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ables” and “Monograph,” the former might also have been drafted by the Lius. Following this logic, the present essay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me selected historical figures and analyzes the rationales behind their three-grad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which each individual is classified as “high,” “middle,” or “low”).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is appraisal system and that of the Liu father and son shows that they indeed share some intrinsic similarities.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attribute the “Tables” to Liu Xiang and Liu Xin. There is much room for further conside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Tables” in modern scholarship.

Keywords: Placement, kin, relatives of the empress, promoting the good and punishing the evil, appraising people in nine grades, *Seven Synopses*